

美國哈佛大學 「帝國後的中國」會議報導

涂豐恩 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學程博士生

今年適逢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世界各地均有不同的紀念活動。美國哈佛大學亦於今年 11 月 4 號，舉辦一連兩天「帝國後的中國：記憶 1911」（China After Empire: 1911 Remembered）研討會，從學術研究角度，對百年前那場翻天覆地的歷史事件，提供多元的視角與反思。本次會議由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辦，蔣經國基金會、哈佛燕京學社與波士頓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合辦。主講人除美國本地學者外，也包括許多來自臺灣、中國和日本的知名學者。

綜觀整場會議，最大的特色凸顯跨學科的取徑和對話。會議尤其重視文學與影像對於革命歷史的再現，不少場次均集中於此議題之上。因此，除了歷史學者的觀點外，本次會議中來自文學史與藝術史學者的論文，讓以往許多被壓抑的聲音，透過不同的媒介和視野，重新被挖掘出來。這正呼應了本次會議的標題：不只關注辛亥革命爆發當下的經過，更要觀察這場事件如何透過不同的方式，被人們記住，亦或者遺忘。

現任費正清中心主任、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柯偉林（William Kirby），在開幕致詞中就提到，今日走進任何美國一家書店，觸目所及均是大談中國政經實力的著作。但慣於回首過去的歷史學者不應忘記，百年前的這個時刻，書肆之中其實亦充斥著幾乎相同標題的著作：中國覺醒、中國崛起，凡此種種。他說，任何人只需稍加瀏覽哈佛大學的圖書目錄，就不難發現這個現象。這樣的

今昔對比，尤其引人深思。但百年以來中國畢竟經歷了巨大而急遽的轉變，他因此從商業、公共建設、教育與政治四個方向，簡要地說明這段過程。對於未來，柯偉林借用了「天下為公」四字，作為中國發展的期許。

本次會議的六個場次，均有不同焦點。第一場「目擊 1911 —— 革命與奇觀」（Witnessing 1911 — Revolution and Spectacles），由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歐立德（Mark C. Elliott）主持。多倫多大學教授顧伊與復旦大學教授顧錚均討論攝影在歷史記憶中扮演的角色，分析革命與革命者的形象，如何透過報刊等媒體，在大眾心中留下深刻的、不可磨滅的印記。哈佛大學博士生 Devin Fitzgerald，則聚焦在西安一地。辛亥革命爆發之時，滿人聚居的西安城，經歷了一場血腥的衝突：約兩萬名滿人遭到屠殺。這個突如其來又震撼人心的暴力場景，引起了各方人士的關注，並留下許多各不相同、時而互相衝突的文字記錄。Devin Fitzgerald 將這些史料交相比較，指出其中真實與虛構，帶領聽眾了解這些寫作者各自的背景和立場，如何導致了記憶的歧異。北京大學教授夏曉虹，同樣以微觀的角度，討論辛亥革命中的另一個片段：貴林之死。在清朝末年，身為滿人的貴林其實受到許多漢人知識菁英的推崇，甚至被稱之為「清朝孔子」。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何以會在辛亥革命中遭到殺害？藉由這個事件，夏曉虹重新考慮滿漢間的矛盾在革命中的角色。

循此，歐立德在評論時指出，美國漢學界曾一度認為晚清時期，滿漢之間並不存在激烈的矛盾。持此意見者，又以前耶魯大學教授芮瑪麗（Mary Wright）最為知名。但本場次的論文顯然提醒我們，滿漢之間的衝突仍是辛亥革命中不能忘卻的重要因素。

第二個場次則討論後革命時期的社會與文化。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永發在會議中，藉著回顧曾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譚延闓的一生，具體而微地追索革命前後的歷史變遷。譚延闓（1880-1930）出生於晚清末年，還曾經考取科舉，並成為湖南立憲派的要角。但辛亥革命過後，他加入國民黨，又數次出任中華民國的重要官職。其中，他也曾與袁世凱產生齟齬。他的一生因此見證了近代中國的起伏與脈動。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 Joshua Hill，則探討民國初年的選舉文化——這是他甫完成的博士論文的主題。他指出，民初報刊與選舉文化之間存在著微妙的互動：報刊知識分子原本大力支持選舉，並提倡「選賢與能」，但他們對當時的選舉文化，以及候選人的行為卻深感不安，遂轉而撰文批評。廣州美術學院研究員李偉銘，則藉由分析《天荒》雜誌，讓人看見那些在後革命時期被邊緣化的「革命遺老」，如何藉由書寫抒發他們對於世道的感嘆。與清遺老相比，這些革命遺老是另一群經常被歷史所遺忘的人群。

第三個場次則進入文化與文學的領域，從不同的層次探索近代中國的轉型。

南卡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教授 Michael Gibbs Hill 與德州奧斯汀大學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教授蔡建鑫分別探討林紓 (1852-1924) 與連橫 (1906-1916) 的寫作，這兩個近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一在中國，一在臺灣；一個堅持文言文翻譯西方當代小說，一個用傳統體例撰寫歷史，且積極創作古典詩文。他們用最獨特的方式，體現了二十世紀初年文學與文化的劇烈變動。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則介紹由嶺南畫派所主持的三大報刊：《時事畫報》、《平民畫報》與《真相畫報》。在他看來，這三種報刊上的圖畫，雖然在編輯者的用心下，愈趨高雅而精緻，實際上卻是與大眾讀者漸行漸遠，與晚清《點石齋畫報》雅俗共賞的境界，已不可同日而遠。他因此認為，儘管嶺南畫派的畫家們付出眾多心血，這三畫報卻為晚清畫報史「畫下了並不怎麼完美的句點」。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李孝悌，則將目光投向晚清的戲曲。他認為，晚明的時事劇早就已經在娛樂之外，承擔傳遞新聞的功能，而晚清戲曲又將此更推進一步，成為二十世紀政治活動，社會啟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並利用 GIS 功能，將清末上海的茶館與劇院一一標示出來。

會議第二天的場次，同樣由文學與藝術研究拉開序幕。中央研究院院士、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王德威，帶領讀者回顧一個世紀以前梁啟超在《新中國未來記》的烏托邦想像。對於梁啟超而言，革命不只在政治，也

在文學。在梁啟超高舉「文學革命」之後，革命一詞早已溢出原本狹義的範疇之外。而今我們在各個領域中，都可聽到高唱「革命」的聲浪。然而，王德威追問，在這樣的時代裡，我們是否還能夠感受一百年前「革命」一詞那激動人心的、不可思議的巨大力量？相較於此，哈佛大學藝術史系教授汪悅進，則從視覺文化提供獨特的視角。他探討的是 1911 前後中國畫作中關於月亮與月光的描繪，而他發現，正是在此一時期，畫家利用月亮創作出一種新的意象：月光不再指涉著靜謐，反而有種蠢蠢欲動的不安，許多作品更將月光與在夜裡出沒的暗殺者聯繫起來，成為革命時代獨特的場景。衛斯理學院 (Wellesley College) 的中國文學教授 Ellen Widmer 則分析報人詹塏 (1860?-1911?)，其小說《中國新女豪》、《女子權》，與其所編輯的《漢口中西報》。在虛構的小說與報端的政治文論之間，我們不僅可以看見兩者的互動，也可以捕捉詹塏對於中國社會發展的理念。

會議的第五個場次，則從空間的角度探索歷史記憶的形塑。來自馬里蘭聖瑪麗學院 (St. Mary's College of Maryland) 的中國史學者 Charles D. Musgrove 重新探討民國初年國民黨如何藉由各類國家祭典與儀式，甚至是假日的制定，創造出正統的歷史論述，與影響久遠的歷史記憶。路易斯威爾大學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教授賴德霖 (Delin Lai) 也處理了同樣的議題，但身為

建築史家的他，更聚焦在空間之上。在他看來，民國初年的各種以紀念之名所創設的建築，反映了當下的集體心態，以及政治崇拜的形式。但在此同時，他也提醒我們，這些建築物，往往從中國歷史中擷取靈感，挪用符號。換言之，這些建築物不只引進西方模式，同時也開啟了古與今的另一種對話。

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教授 Joseph R. Allen 則將時序往後推移，討論 1945 年後國民黨政府在臺灣，如何藉由改變都市地貌，消抹日本殖民政府的印記，轉換人們的政治認同。在這段時期內，國民黨政府在各地遍佈孫中山與蔣介石銅像，但諷刺的是，因為臺灣政治的本土化運動，這些政治舉措

受到強力地抨擊。而曾經的偉人銅像，如今幾乎淪為回收場的對象。

會議的最後一個場次，邀請來自臺灣的前任及現任國史館館長，以及中國和日本的代表學者，帶來「臺北、東京與北京的觀點」（Perspectives from Taipei, Tokyo, and Beijing）。前任國史館館長、現任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林滿紅，從百年來貨幣的歷史，探討中華民國政治、社會與經濟的互動。她藉由流通貨幣的多元與統一，指出二十世紀初期政府權力的升降。而貨幣上頭所呈現的符號，更反映社會集體心態的變遷。東京大學中國近代史教授村田雄二郎，帶來日本學術界對於中國革命的研究回顧。據他所言，日本學界傾向從中國明末以來的

思想和社會變遷，探討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而其背後的動力，則是要了解中國近代化的過程。但在本次演講中，他提出另一種更具挑戰性的觀點。他認為，要理解辛亥革命，不妨回到中國歷史上南方與北方士人長期以來的對抗，清朝末年「改革派」與「革命派」之間的

競爭，也可以放在此一脈絡下加以理解。他指出，活躍於北方的「改革派」與聚集於南方的「革命派」，對於政治情勢自然有著截然不同的感受，這也導致了他們政治理念的差異。另一方面，南京大學的陳謙平教授，從當代中國回顧百年來的發展，他特別著重國際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一如許多中



「臺北、東京與北京的觀點」場次，由左至右為 William Kirby、林滿紅、村田雄二郎、陳謙平、呂芳上。（攝影／廖文碩）

國學者，他也主張中國的現代轉型歷經了一百年，至今仍未完成，尚待努力。會議的最後一場演講，則由現任國史館館長呂芳上發表。他特別強調臺灣歷史學者對於辛亥革命的許多研究成果。此外，他也指出，中華民國百年的歷史，應該同時納入 1949 年之前中國的歷史，以及臺灣過去的發展。唯有在此開放的視野下，我們才能適當地理解百年中華民國史的複雜內涵。

會議最後的圓桌討論，由柯偉林主持，三位負責籌劃會議的學者——歐立德、王德威與汪悅進擔任引言。歐立德向在場的聽眾提出這樣的疑問：這兩天以來的會議，若是編輯成書，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角度？這是否只是又一場研討會，與又一本的論文集？換言之，有什麼重要的觀點是值得我們重視

的？王德威則再次強調虛構的力量，在辛亥革命歷史中扮演的重大角色，這場革命不只是政治行動，也凸顯了近代中國對於烏托邦的想像。汪悅進同樣認為從藝術史的角度出發，我們將會看見截然不同的風景。比如，二十世紀的頭十年也是立體主義席捲歐洲藝術界的時代，這樣一場藝術史上的革命，也透過各種管道傳到了中國，卻未激起同樣的反響。是什麼樣的社會心態與文化脈絡，形成了這樣的結果？從政治革命到藝術革命之間的落差，在在值得思考。循此，也有聽眾認為辛亥革命應該放在全球視角下理解，既要凸顯它與不同國家的互動，同時也不妨將同時期的其他革命相互比較。從這種回響看來，對於辛亥革命的研究，在事件發生百年過後，仍加繼續擴大、深化。